



倬云在接受访谈时曾这样说道：“抗战时期一批川军赶赴前线时，我弟弟在上学，我不能上学。我母亲带了许多女工烧开水给川军喝，我坐在门口的抱鼓石上，望着不见边的军人。他们说：‘这些人一个都回不来的。’那时候我七岁左右……”而最黑暗的时刻里，偏偏闪烁着最耀眼的人性光辉——“满路的人奔走，没有人欺负人，挤着坐船坐车逃难，上车上船都推着老弱妇女先上，自己留在后面。大路上奔走，多少老年人走不动了，给孩子说，你们走，走！”

许倬云哽咽着确信：“我知道中国不会亡，中国不可能亡。”抗战结束后，他回到老家无锡，第一次走进正规学校，在辅仁中学读高一，此前“基本是父亲和舅舅、哥哥和姐姐有机会就点拨几句，大部分时间自己看书，是一种不规律的学习方式”。辅仁中学的隔壁，恰是东林书院，同学不听话，就会被老师带去东林祠堂，对着先人罚站。老师上课时常告诉学生，他们是东林子弟，有东林的气节，“东林书院的那副对联，我们每个人都记得很熟，像是生命的指导”。

对于20世纪中国的革命，许倬云并非没有反思，但他并不希望因为这种反思和批评，就把自己推到所关切的中国的对立面。他的作品和演讲里弥漫着人道主义情感，足见悲悯之心。他也指出，不论欧美还是中国，专家型的人才越来越多，但是真正能够把专业跟社会、

国家、世界发展的命运联系起来的人越来越少。“新的理想没有出现，旧的理想被放在一边。我们没有机会再培养一批知识分子，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，是网络知识分子，是检索机器，不是思考者。”

“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”此系80余岁的陆游最后发出的抗金号召。800多年后，90余岁的许倬云在面对“回顾过去，最重要的遗憾是什么”的提问时，亦选择用这首陆诗作答。他说，在抗战时期长大的人，“‘中国’两个字刻在心里。七八百万的兵员在阵地上死掉，三四千万的人被杀、被轰炸，不能忘，忘不掉”。

传统延续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，五四肆意挥洒的理想主义，对自由、公平等现代价值的追求，对学术和智慧的渴望，塑造了这代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，他们借此安身立命。而面对当今愈发纷繁复杂、愈发矛盾对立的“赛博纪元、流量王朝”，大众或许会疑惑：启蒙是否仍然具有价值？“世俗”与“超越”如何共存？知识分子是否依旧具有影响他人、社会和时代的能力？

本文试图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，乐观地得出结论：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持续下降，乃过去几十年的世界趋势。但人生代代无穷已，“断层”虽难免，“继承”亦不缺。读书人一时的痛苦，未尝不是某种高贵的指向，等待与希望中，文化比权力、金钱更具尊严。启蒙永远在路上，青春之歌永远在吟唱，它是理应没有终结的进行时，只不过需要调整一些方式与姿态，与代际特征磨合。道德和伦理的底线在哪里，以及终极灵魂拷问——人应该做什么？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总归需要一线光明的指引与点拨，需要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理论。

爱如一炬之火，万火引之，其火如故。那么，继续做一个坚韧、沉稳、宽容、柔软、真诚的燃灯者罢。去关心国族的命运、百姓的呼声；去浇灌知识的大树、播撒学术的种子；去珍惜心底那个安守在书桌旁的少年，直至诀别的一天。

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。士为家国，一生一诺。

在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的许倬云。

